

内生还是外生：农村社会的“发展二元论”及其破解

吴越菲¹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00241)

【摘要】：当前农村已经不再仅仅作为农业生产区域而是作为综合性的社会区域活跃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版图上。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暴露出深层次发展动能上的矛盾，思考农村的新内生发展道路迫在眉睫。“外生发展—内生发展”在农村研究中构筑了一种“发展二元论”，传递了有关发展责任和控制权的极化观点。21世纪以来的新内生发展理论完成了从二元论到混合论的理论超越，并且带动了社区主导、网络化取向以及协商取向的农村社会创新。反思西方语境中新内生发展理论的现实基础、意识形态底色以及理论限度，可以为思考农村新内生发展的中国道路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

【关键词】：内生发展 外生发展 新内生发展 农村社会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农村社会发展取向的命题之争

农村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尤其是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现代化框架中，农村长期面临边缘、弱势、滞后、不平等的发展处境。伴随农村新业态、新产业的出现，农村已经不再仅仅作为农业生产区域而是作为综合性的社会区域活跃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版图上。然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产业基础不牢、集体经济效益较低、人口大规模外流、民生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乡村治理能力相对不强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共性问题。在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着深层次发展动能上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在资源配置和发展空间上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整体而言，农村在土地使用、财政资源、基础设施投资、人口流动、管理体制、政策框架、村庄规划等各个方面仍然依赖于政策驱动型发展和国家帮扶型发展方式¹。对于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发展资源相对有限的中西部地区农村而言，发展自主性缺乏和后劲不足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阻碍。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和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分别提出了“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要求。然而，中国农村资源禀赋差异显著，单纯强调内生发展在实践中面临诸多限制。农村社会究竟应该是自主的发展体还是依附的发展体？农村可持续发展又究竟应当依靠外部力量还是内部力量？这似乎成为农村社会发展无法绕开的基本理论问题。实际上，以上问题的回答在学术史上关联到农村研究中出现的两个极具张力的理论命题——“外生发展”与“内生发展”，它们指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农村社会发展取向。重返农村发展的命题之争，有助于在新阶段、新格局、新机遇背景下重新打开认识农村的理论窗口，进一步推动中国农村治理的社会创新。

二战以后，外生发展模式(Exogenous Development)一度成为全球农村发展的思想主流，认为对农村真正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一些外部参数，农村社会发展的基本属性是依赖性。外生发展模式将“农村”在本体论层面假定为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村生产经济体，认为农村发展嵌入在一个以城市为中心引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体系中。在一个城市中心主义主宰的发展空间中，农村社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低生产力、非中心、非主流、边缘、落后甚至是失败。外生发展模式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促进城乡

作者简介：吴越菲，女，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上海市“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转型中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贫困流动性及其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9BSH080)；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时期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及其应对方式研究”(项目编号：2021BSH002)

部门融合，增强农村的发展竞争力。在农村治理政策上，外生发展模式强调自上而下的干预、支持、投入、改造对于改善农村发展境况的必要性和正义性，通过资助者驱动或外部导向的路径来实现生产水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文化环境、人口与资本流动性等方面的增长性发展²。可以看到，外生发展模式为农村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结构决定论的发展认识和病理学的解决手段。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农村发展研究重新转向区域发展和地域性治理的基本视角，内生发展模式 (Endogenous Development) 开始成为一种替代性的理论思潮。内生发展模式在认识论层面假定了一个具有自主发展潜力的发展实体，认为农村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产生于内部，依赖于其内在的驱动力和本地资源，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完全可以本地化地解决。阻碍农村社会发展的正是来自于对本地人需求、能力和行动的压制。内生发展理论批判外生发展命题内含的非正义性，尤其是外生发展模式实践中出现的参与缺位、农村发展被代表、地方发展利益外流等问题³。内生发展理论由此提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命题，倡导农村发展中主导一支配位置的转换以及农民、农村作为发展主体的回归。农村发展的主要任务应当是通过促进自发的地方行动来解决自身问题，其主要路径包括赋权、参与、社区行动、能力建设、包容性规划等等。简言之，内生发展模式提供了一种内因决定论的发展命题，旨在让农村重新走向发展的中心。内生发展理论不仅广泛地影响了 20 世纪 80、90 年代间西方国家的政策话语、地区发展实践和空间治理取向，也在中国乡镇企业发展、乡村工业化和就地城镇化的发展中得到了部分实践呼应。

尽管外生发展模式和内生发展模式都各自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发展命题，但各自面临诸多可行性和有限性的理论困局，在实践中也出现过一些失败⁴。20 世纪 70 年代欧洲经济衰退，显示农村发展的脆弱性与其是否接受了大量外部投资并无直接关联。而后被寄予厚望的内生发展理论在实践中的有效性、参与度以及地方行动等方面也都出现了逐渐衰落⁵。对于既有社会资源缺乏的农村而言，内生发展模式的效果并不佳。内生发展理论的失败再一次将“外生发展—内生发展”的争论置于农村社会发展研究的中心，这两个命题具有鲜明的立场差异，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倡导，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农村政策风格，更加使得农村社会发展长期陷入“发展二元论” (development dichotomy)⁶ (见表 1)。

表 1 农村社会发展取向的二元命题

	理论起点	发展假定	主要发展问题	发展重心
外生发展模式 (结构决定论)	部门关系	城市引擎	边缘性与竞争力缺乏	生产力增长与部门整合
内生发展模式 (内因决定论)	区域关系	内在驱力	被代表与权能缺乏	能力促进与地方行动

外生发展模式与内生发展模式人为地在发展理论上造成了一种空间极化⁷，带来了一种封闭性的理论样态和思维方式。因为在现实中，“发展二元论”的任何一端都是脱离实际的。既不可能存在完全脱离本地性和主体性的农村发展，也不可能存在完全脱离外部环境的孤立的农村发展。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都是内外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农村社会不可避免地要与超地方力量进行互动。外生与内生的边界是非常模糊的，甚至这两者本身就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进入点⁸。为此，寻求破解“发展二元论”的农村发展理论尤为迫切。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欧洲国家为主导广泛地推进了“新内生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但较少见具有非西方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回应。如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更好地处理外生发展与内生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聚焦于当代新内生发展理论对“发展二元论”的理论和实践突破，反思性地考察新内生发展理论在欧洲发展的现实基础和理论限度，并深化对中国农村新内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思考。

二、从二元论到混合论：新内生发展模式的理论突破及其实践

基于对原有“发展二元论”中极化观点的理论不满，雷 (Christopher Ray) 2001 年提出了“新内生发展”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概念，用来描述农村既具有本地的扎根性，同时也面向外部世界的交互特点⁹。在过去 20 年间，新内生发展理论提

供了一种混合模式(hybrid model)¹⁰来试图弥合被二元论所切割的农村发展图景。尽管新内生发展理论在不同国家的具体理论表述和地方实践各有差异,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共性来考察其对“发展二元论”的理论突破:

(一)在理论目标上,从封闭性的规范性理论转向开放性的分析性理论

外生发展与内生发展之间的命题之争主要聚焦在农村社会发展模式与道路选择上,在本质上是谁才是“好的实践”(good practice)的应然之争。新内生发展理论并未置身于封闭的类型化思维来框定农村发展道路,而是转向面向事实、拥抱开放性的分析性理论,重新提供了一套思考当代农村社会发展的新叙事。新内生发展理论不是“第三条道路”,它反对任何先入为主的理论预判,而力图在事实层面展现差异化的农村,尤其是农村社会发展中本地行动者和超本地行动者之间的动态权力关系、外部压力与内部资源之间的差异化关联。因此,新内生发展理论所理解的农村社会发展是多元、非线性的。它没有固定的定式,可能是具有连续性的,也可能是变革性的;可能是冲突性的,也可能是整合性的。其理论的终极目标既非优化外部支持,也并非单一促进地方行动,而是在开放的发展进程和既有的关系环境中不断推动地方价值最大化,实现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使农村发展理论具有了长期眼光,内含着平衡经济增长、社会正义与自然资源保护的体系的要求。

(二)在理论分析单位上,从地域性的发展实体转向“地方—超地方”力量之间的网络关系

外生发展模式和内生发展模式的共同点,是都将农村社会发展放置在一个特定的地域单元中进行分析,将农村视为边界明晰的分离性发展实体。新内生发展理论淡化了地域边界在理论构成上的重要性,强化了“地方性—超地方性”这一对分析范畴,从而将农村发展理论推向了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视角——超地方力量对农村社会发展来说是必要的,但地方力量才是塑造未来的潜力¹¹。新内生发展理论实现了一种农村社会地理学的分析,从理解农村地点的地域性转向分析农村地点的社会性。任何地方的社会发展都融合了内生和外生的两种动力机制,是地方性—超地方力量之间互动关系的产物。因此,新内生发展理论的分析单位不再是地域性的发展活动,而是一个地方力量和超地方力量交互作用、动态控制农村社会发展的复杂网络¹²。网络及其携带的社会资本是新内生发展的核心¹³。网络成为了动态机制,使地方知识与超地方知识能够相互联系,共同应对地方发展需求。

(三)在基本理论框架上,从极化的空间叙事转向整合性的社会叙事

无论是外生发展模式还是内生发展模式都在理论立场上放大了特定要素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伴随着内部空间或是外部空间权力极化的理论分析。新内生发展理论基于对农村基本认识的重塑,认为农村经济社会活动既表现为多元性和自主性,同时也与城市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之间具有相互依存性。因此,新内生发展理论采取了一种整合取向(holistic approach)的理论框架来理解农村的多重本质,平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方性和外部性,并将其用于分析“乡—乡”关系中的区域均衡发展问题和“城—乡”关系中的边缘、隔离、资源匮乏问题。新内生发展理论延续了对地方控制的强调,但是超越了分离地看待“地点”的传统思维,更多地在动态农村网络中呈现关系政治。如果说“地域性”强调的是地理临近性,那么“超地方性”则主要是社会性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内生发展理论完成了从极化的空间叙事向整合的社会叙事转变。其不仅强调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地方嵌入性,同时也强调了推动地方行动者广泛地走出来,参与到地方性或超地方性的各种发展进程中来。

(四)在理论构成要素上,从发展问题识别转向建构性、反思性的知识生产

外生发展模式和内生发展模式主要是基于对农村发展境况的不同判断而提出的两大命题,对农村发展问题的识别及其应对构成了以上两大理论的主要内容。新内生发展理论对于“发展二元论”的突破集中地体现在对新兴理论要素的引入上,特别是建构主义和反思性知识。建构主义在根本上确立了新内生发展理论理解农村社会发展的基本眼光,使地点、关系、网络、权力、空间、发展活动等基本理论要素都成为了建构性的存在。农村社会发展被视为这些建构性要素如何被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与此同时,新内生发展理论相比传统农村发展理论而言,引入了更多的反思性,反思性地看待农村权力场域中的权力关系、不同行动者在特定地点上的关系交互、不同地点与外部资源连接的差异性、社会资本对不同农村发展的影响差异等等。新内生发展在理论

上尤其警惕本质主义的理论预判、同质化的农村描述以及封闭性的发展想象。新内生发展理论指引下的农村发展实践旨在推动多元行动者的实践反思、知识经验分享以及对于发展假设的自我反思。在农村社会发展研究上也特别强调研究部门与实践部门的互动¹⁴、跨学科方法的协同¹⁵以及国际性比较研究¹⁶。

在实践层面，新内生发展理论提供了一系列农村治理的新取向。近年来，许多国家在新内生发展理论的指引下开展了一大批农村社会创新项目，用上下互动、内外协同的方式来促进地方发展转型、激发农村社会活力。其项目实践应用集中在以下领域。

一是“社区主导”(community-led)的发展实践。目标是在新内生发展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动员地方社区来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支持地方社区在社会政策执行上具有更多的参与空间¹⁷。“社区主导”的发展实践推动了农村发展由“资助”向“投资”的转变，它常见于通过实施赋权项目和能力建设项目来活跃地方发展氛围，增强农村社区对发展过程的控制性。实践的重点是活化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知识资源、关系信任资源以及集体行动能力，使农村社区具备回应社区需求、适应外部环境挑战、主动对外创新的发展能力。农村发展实践中的工作者过程性地协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地方性和超地方性因素之间的关系，使农村社区能够聚焦地方特色形成一个多方共振的灵活发展体。在一些社区发展评估中形成了整合的评估取向，同时考量内生性要素和外生性要素对农村社区发展的共同促进作用¹⁸。“社区主导”的发展创新与制度主义走得更近，尤其强调在社区发展中强化制度能力从而有效地应对外部冲击，其首要实践重点是推动社区制度和社区治理体系的升级¹⁹。

二是网络化取向(networking approach)的发展实践。这一发展取向不仅形成了一种以动态网络视角来看待农村的基本共识，而且在实践中推动农村社会形成行动共同体²⁰。新内生发展理论并没有将发展活动限定在特定的地域范围之中而展现发展的地域情境性，而是在实践中将“网络”作为农村社会发展的中心。“网络化”成为了一种动态的发展机制和发展实践，通过它可以整合地方知识和超地方的知识来回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网络的形成和稳定性是成功发展的前提。因此，促进不同类型行动者在农村社会发展上的伙伴关系和长期互动关系、建立一种包容性的城乡关系和部门合作关系，成为新内生发展理论指导下的重要实践要义。网络化取向的发展创新在更大网络中配置农村社会发展的资源和责任，而协调农村网络关系(包括区域联系和跨部门联系)作为新内生发展模式的重要策略，被认为是推动农村发展的重要突破点。

三是协商取向(negotiated-approach)的发展实践。为了让农村社会更多地增加对发展的权力控制和控制感，新内生发展理论框架下的农村发展实践重点，就是在发展过程中促进横向和纵向维度上不间断的权力协商、知识交换和共同行动。协商取向的发展实践主要包括两条路径：一是通过组织一些地方活动来活跃地方氛围，在一些发展议题上创造地方自治空间和草根规则；二是考量自上而下的政策指令如何与地方发展的积极性相衔接，实践者也需要做许多政策解释和政策传递工作。新内生发展模式不是简单的农村扶持和农村建设，而是通过外部刺激和关系互动来促进农村发展的潜力、动机和创新。

三、欧洲新内生发展模式的现实基础与理论限度

整体而言，过去一二十年来新内生发展理论的实践主要反映的是欧洲的理论经验产出。新内生发展模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观照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有必要进一步回到新内生发展理论的知识生产场域，对其理论产出的现实基础、意识形态底色以及理论限度作出反思性的思考。

首先，社会整合是欧洲社会理论的经典议题，也是新内生发展理论的终极关怀。以“混合论”为主要特点的新内生发展理论在当前欧洲的盛行既是一种理论的必然，也是经济社会基础与资本经济危机下区域整合危机共同作用的产物。从经济社会基础来看，较早卷入全球化进程的欧洲农村已经具备较强的发展外溢性和与更大网络的连接性。在经济发展、人口流动、社会交往、文化互动、政治行动各个方面，欧洲社会已经普遍形成了超民族国家的“区域”概念和理论关怀，对区域经济与社会整合的诉求成为农村发展理论建构的内在精神驱动。从现实诉求而言，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的政府负债和区域发展不均衡使农村复兴再一次成为欧洲社会的发展难题。然而对于中国而言，尽管当前农村社会具有了更大的开放性和对外连接性，但在经济社会活动上的跨地域网络联系仍然主要发生在城乡之间，而非乡乡之间。相比跨地域乡乡之间的区域整合问题，城乡之间的部门整

合和区域整合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

第二，欧洲新内生发展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具有内在契合性，追求更有流动性和网络嵌入性的农村，但其通过建构一种“混合论”而将农村变成了一个混杂的权力场域。农村似乎成为了一个无人掌控，过度具有开放性、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的社会空间，尤其国家在农村发展中的角色变得模糊。在中国，纵向权力而非横向权力对农村发展的影响广泛地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理论讨论的焦点。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潜藏两种具有负面影响的发展观。一是个体主义思维的农村发展观，即将自我发展利益和控制权获得的最大化视为农村社会发展目标，忽视部门之间、区域之间的利益协调以及服从国家整体发展目标的利益妥协。另一种是不加批判的平民主义观点。参与、赋权、资本—能力建设等标榜所谓“正义民主”的手段在实践中面临诸多问题。比如许多国家大量出现了表层参与、形式化参与、仪式化参与、强制性参与等现象。“参与”可能强化贫困与脆弱性背后的权力分化²¹；在现实中实现农村社会发展中的社区主导、网络化以及发展协商，具有非常强的条件限制²²；当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与自下而上的社区协商相碰撞，可能会造成临时性的非可持续发展结果，出现表里不一的“假内生发展”²³现象，等等。

第三，欧洲新内生发展理论将重点放在整合与网络上，这对于解释农村社会发展的差异性是不够的，而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正是巨大的内部差异。虽然新内生发展理论从地方性要素与超地方性要素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农村，但并未差异化地指出这种互动关系为什么会产生以及对农村社会带来了哪些不同的发展类型。从目前学界报告的欧洲经验来看，新内生发展理论导向为农村社会创新带来了全新的发展观和增长点，但是发展实践效果的差异性较大，实践效果也较大程度受到政府行为、多重制度关系的影响。新内生发展模式的实践成效与农村本身的经济社会基础之间的内在关联少有被反思。目前研究比较多地聚焦成功发展案例，而缺少对普通案例、失败案例的研究回应。另外，“网络”被新内生发展模式视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因素。需要警惕一种可能的发展悖论，即农村发展中层层叠加的网络可能使农村在网络结构中最终失去发展控制权。当前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城乡人口流动和政府规划双重影响下的经济社会转型，这就意味着农村社会大量存在变动和不稳定的社会关系而非相对稳定的结构化的网络联系。

四、总结与讨论：迈向农村新内生发展的中国道路

农村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它复杂多变，在许多人眼中更是拥有着不确定的未来²⁴。新时代中国农村迫切地需要新内生发展。“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应该回归到“三农”本身，从乡村的内部找到突破点。全面乡村振兴的实现首先应当建立在一定的地方自主性和收益性基础上，实现“需要发展的人群”和“实施发展的人群”之间的深度融合。但是又不能光提“内生发展”，因为中国农村社会整体面临发展基础较弱、发展能力有限的问题。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农村社会发展既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也迫切地需要链接外部资源。正因如此，突破外生发展与内生发展的二元论，思考具有整合特点的中国农村新内生发展道路迫在眉睫。

(一) 当今世界的农村社会发展已经呈现出越来越明晰的“关系/网络转向”，强调“地方—超地方”利益相关者围绕发展议题的有效互动

如果说西方学者所阐述的新内生发展重点是整合已有联系的话，那么中国农村的新内生发展重点应当是将眼光投向对远距离资源的培育和动员上，推动农村社会发展影响的外溢和跨地域的关联交互网络，尤其应当充分发挥中国具有优势的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村社会发展的赋权。一旦超地域的发展网络逐渐形成，关系治理就会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如何分配发展网络中的权力角色、构建发展网络中的关系机制、处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行动之间的协同性和不一致性，应当在关系/网络治理方面重点积累中国农村发展的本土经验。

(二) 新内生发展理论内在地包含国家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角色改变

对于中国而言，新内生发展不是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发展权力的争夺或此消彼长的接替，而是国家权力在作用机制上的优

化和转型问题。农村新内生发展的中国实践一方面要考虑国家权力如何地方化，特别是国家政策如何更好地向基层传递的问题。除了依靠体制内的方式，还可重点探索通过跨部门的协同合作和项目运作创造多方发展对话的空间，达成利益相关者的相互理解和利益整合。另一方面，国家在农村社会发展上扮演的角色、干预的范畴以及支持的方式有待进一步优化，农村发展上应当实现刚性规划与保护性措施和刺激性措施的结合。国家角色多从单一的福利供给者和干预者转向综合的协调者、管理者和始动者；农村社会治理从短期的福利资助转向更加具有未来眼光的社会投资。同时，亟待探索一些新的治理形式在中国农村的运用，比如网络治理、弹性治理、远程治理等等。

(三)农村新内生发展的中国道路要在农村发展中切实追求社会的集体效能

集体效能以社会网络作为条件，不仅仅体现在生产合作、生活互助上，更充分地反映在发展活动的动员、组织、协调、控制和秩序维持上。我国应当探索具有本土适应性的农村治理参与机制，将地方性的知识和行动价值与国家对基层的组织化进一步结合。比如，1980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作为政府与集体的合作产物，不仅依赖于政府建立了一个低成本、高效率运作的政策框架，还依赖于村落社会共同体在地方发展中的活化和参与。参与的关键问题是重点解决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合理决策和代表问题。新内生发展的中国道路应当重点打开两种类型的参与空间：一种是邀请性的发展参与空间，由正式或国家认可的框架来创造和合法化；另一种是大众或创造性的发展参与空间，主要通过始创性的集体行动而产生。应当面向农村发展的问题和需求，选择相应的发展模式，探索动态弹性的参与模式。

(四)新内生发展理论内在地要求在中层次的治理体系中识别和撬动地方发展的创新性，推动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农村社会创新不仅要考虑如何让地方行动者更多地调动起发展的热情，也要考虑如何创造面向全球的联系和合作。过去中国农村社会治理主要处理的是国家、政府、集体组织、农民之间的关系，围绕的主要是经济资源的分配。未来农村社会治理将会涉及各个层面、各个部门的治理者和利益相关方。因此，农村新内生发展需要“全球化地思考，地方化地行动”，最终目标是使本地地方的人能够真正地受益，切实在与外部的联系中获益。农村发展政策中公共资源的投放既要考虑更需要得到帮助的对象，也要兼顾最具发展潜力的社区。

回到农村社会发展研究，笔者认为还有一些需要讨论和进一步厘清的问题。第一，从理论建构角度而言，“新内生发展”还缺乏清晰的中国定义和实践框架。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新内生发展的中国道路要平衡上下、内外、短期与长远、经济与社会以及稳定与变迁之间的关系，除了扎实的理论工作之外，亟待新内生发展的实践经验能够用以对话西方经验。第二，农村发展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目前新内生发展的理论关注和实践主要集中在地理学、社会学以及城市规划，而缺少其他学科的关注。农村研究本具有跨学科的研究取向，如果农村研究、农村规划、社会政策之间无法形成必要的对话，农村研究的狭隘问题²⁵就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第三，尽管不同国家跨学科的研究者们都对农村保有研究的兴趣，但是农村研究的基本定义、概念、方法和框架却具有明显的政治—文化情境的差异。不得不承认，农村研究内部确实充满了各种知识界限，不同国家的农村研究又具有较为不同的知识生产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研究就必然是碎片化、领地化的。在一些议题上，比如“乡村性”“农村空间治理”等等，都具有共同主题。农村发展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争论的场地，也在真真切切地对现实发展起到引导作用。

注释：

1 张行发、徐虹、张妍：《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以贵州省Y县为案例》，《当代经济管理》2021年第10期。

2(1)B.Leick and Thilo Lang, “Re-Thinking Non-Core Regions: Planning Strategies and Practices Beyond Growth,”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vol. 26, no. 2 (2018), pp. 213-228.

-
- 3(2) M. Woods, *Rural Geography: Processes, Responses and Experiences in Rural Restructuring*, Sage: London, 2005, pp. 221–291.
- 4(3) Gkartzios, M. and Mark Scott, “Placing Housing in Rural Development: Exogenous, Endogenous and Neo-Endogenous Approaches,” *Sociologia ruralis*, vol. 54, no. 3 (2014), pp. 241–265.
- 5(4) Gkartzios, M. and Philip Lowe, “Revisiting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in M. Scott, N. Gallent and M. Gkartzio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Rural Planning*, New York: Taylor and Francis Inc., 2019, pp. 159–169.
- 6(5) Lowe, P., C. Ray, N. Ward, et al., *Participation in Rural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European Experience*, Centre for Rur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Newcastle, England, 1998.
- 7(6) Lowe, P., Murdoch, J., Ward, N., “Networks in Rural Development: Beyond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Models,” in J. D. Van der Ploeg and G. Van Dijk, *Beyond Modernisation: The Impact of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Assen: Van Gorcum, 1995, pp. 87–106.
- 8(7) Hettne, Björn, “The New Regionalism Revisited,” in F. Söderbaum and T. M. Shaw, *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 A Palgrave Read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22–42.
- 9(8) Ray, C., *Culture Economies*, Newcastle upon Tyne: Centre for Rural Economy Newcastle University, 2001.
- 10(9) Georgios, C., Nikolaos, N., Michalis, P.,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A Path Toward Reviving Rural Europe,” *Rural Sociology*, vol. 86, no. 4 (2021), pp. 911–937.
- 11(10) Ray, C., *Culture Economies*, Newcastle upon Tyne: Centre for Rural Economy Newcastle University, 2001, pp. 25–36.
- 12(11) Terluin, I. J.,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ral Regions of Advanced Countries: an Overview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orie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 19, no. 3 (2003), pp. 327–344.
- 13(12) Bosworth, G., et al., “Empowering Local Action Through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LEADER in England,” *Sociologia Ruralis*, vol. 56, no. 3 (2016), pp. 427–449.
- 14(13) Atterton, J. and Thompson, N., “University engagement in Rur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Northern Rural Network,” *Journal of Rural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vol. 5, no. 3 (2010), pp. 123–132.
- 15(14) Lowe, P. and Philipson, J., “Reflexiv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e Making of a Research Programme on the Rural Economy and Land U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57, no. 2 (2006), pp. 165–184.
- 16(15) Gkartzios, M. and Shucksmith, M., “‘Spatial Anarchy’ Versus ‘Spatial Apartheid’: Rural Housing Ironies in Ireland and England,” *The Town Planning Review*, vol. 86, no. 1 (2015), pp. 53–72
- 17(16) Marango, S., Bosworth, G., Curry, N., “Applying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to Delivering Sustainable

Local Nature Conservation,” *Sociologia Ruralis*, vol. 61, no. 1 (2021), pp. 116–140.

18 (17) High, C. and G. Nemes, “Social Learning in LEADER: Exogenous, Endogenous and Hybrid Evaluation in Rural Development,” *Sociologia Ruralis*, vol. 47, no. 2 (2007), pp. 103–119.

19 (18) Rodríguez-Pose, A. and Tobias Ketterer,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gging Regions in Europe,” *Regional Studies*, vol. 54, no. 7 (2020), pp. 974–986.

20 (19) Wenger, E., McDermott, R., Snyder, W., *Cultivating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A Guide to Managing Knowledge*,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2, pp. 219–232.

21 (20) Dill, B., “The Paradoxes of 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ion in Dar es Salaam,”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40, no. 4 (2009), pp. 717–743.

22 (21) Shucksmith, M., “Endogenous Development,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Inclusion: Perspectives from LEADER in the UK,” *Sociologia Ruralis*, vol. 40, no. 2 (2000), pp. 208–218.

23 (22) Gkartzios, M. and Scott, M., “Placing Housing in Rural Development: Exogenous, Endogenous and Neo-Endogenous Approaches,” *Sociologia Ruralis*, vol. 54, no. 3 (2014), pp. 241–265.

24 (23) Cloke, P., “Whither Rural Studie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 1, no. 1 (1985), pp. 1–9.

25 (24) Cloke, P., “Whither rural studie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 1, no. 1 (1985), p. 8.